

河北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個案研究 (1957-1958)

● 李 彤

摘要：1957年夏，反右運動在城市進入高潮時，中共中央指示在農村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與反右運動研究相比，學界對此關注不多，微觀、個案研究更少。本文以河北省Y縣為中心，依託縣、村兩級地方和基層檔案資料，梳理運動在鄉村底層的開展情形，呈現不同群體的態度差異，探討運動的內在目標和政治邏輯。文章認為，Y縣農村社教運動的過程顯示，與城市反右運動相比，農村社教運動的對象、內容、地域有所不同，但手段和實質與城市反右運動有着極大的相似性，實際是一場底層反右運動。運動被賦予了意識形態和政策功利的雙重目標，將「思想問題」升格為「階級鬥爭」，呈現出當代政治生活和政治運動的貫通邏輯。

關鍵詞：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統購統銷 農業合作化 階級鬥爭 反右運動

1957年夏，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一場「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下簡稱「農村社教運動」）在鄉村底層鋪開。運動持續一年左右，規模大、範圍廣。這是1949年以後中國開展的第一場大規模農村社教運動。

關於這場農村社教運動，學界已有一些探討。討論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對運動過程的梳理；二是其與反右運動的關係。關於運動的過程，既有研究大多是聚焦高層政策的宏大敘事。孫東方的〈「大躍進」前夕的一場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山東昌濰為個案〉一文，是少有的、較有代表性的地方性研究。孫文以山東昌濰專區為中心，依託相關檔案資料，對專區社教運動的整體歷史過程進行了梳理^①。文章雖有地方史料的運用，但多是地方政策文件，缺少對政策在底層鄉村執行和運作的敘述、分析。農村社教運動展開時，當局已經發動和展開反右運動，學界的討論非常關注社教運動與

* 筆者誠摯感謝三位匿名評審人和編輯老師的中肯修改意見，惟文責自負。

反右運動的關係，並對此存在不同的觀點。李若建的〈庶民右派：基層反右運動的社會學解讀〉一文廣泛利用了各地的方志與文史資料中的回憶文章，從社會的流動模式、組織內部矛盾、手段與目標衝突三個方面，就基層反右運動的成因作出了社會學闡釋。文章認為，絕大多數「庶民右派」是工作、生活在小城市和鄉村的受過一點教育的普通人，受「在工人、農民中不劃右派」的中央政策所束，反右運動在鄉村幾乎沒有展開和形成規模^②。研究拘泥於文本，將佔農村人口主體的底層農民排除在「庶民右派」範圍外。韓鋼則在研究中指出，「農村、企業、高等學校的社會主義教育，實際上是反右派鬥爭在民間的鋪開」^③——把農村社教運動視為反右運動在農村基層的延伸和擴展，或者說，就是農村基層的反右運動。這不僅是對農村社教運動歷史的一種新認知，而且進一步拓展了對基層反右運動的研究。但因韓文不是專文論述，對此結論沒有具體論證。近些年關於反右運動的研究，一個重要的進展就是研究目光下沉，不限於將目光聚焦於中共高層的醞釀和部署以及非中共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的遭遇。王海光的研究〈1957年的民眾「右派言論」〉另闢蹊徑，以從下到上的視角，介紹了當年底層民眾的「反右言論」，探析反右運動發動的深層原因。王文認為，相較民主黨派頭面人物和知識精英，民間底層的「右派」言論對共產黨的統治更具有挑戰性，成為促使整風運動轉向的重要原因^④。程曦敏的〈四川省江津縣直屬機關反右派鬥爭的「收」「放」變遷〉一文聚焦於基層反右運動的主持者，呈現了他們在運動過程中搖擺於「收」、「放」之間，維持政治平衡的兩難處境及政策因應^⑤。

上述研究視角的轉向，極大充實和豐富了反右運動的研究，對於全面完整地還原反右運動歷史極具意義。但總體而言，底層反右的研究還是初步的，對鄉村草根的反右運動研究寥寥。研究視角真正下沉到鄉村底層的生動、細膩的個案研究更是缺乏，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相關檔案史料發掘極少。由於農村社教運動目標是鄉村農民和基層幹部，他們不大可能像精英階層的「右派」那樣，留下大量文字，即使留下文字也鮮有出版與發表的可能。鄉村底層史料的缺失，使以往研究無法較好地還原農村社教運動展開過程的歷史細節。

本文旨在探討，1957年在進行一場以城市精英為鬥爭對象的反右運動的同時，為甚麼還要開展一場針對鄉村底層民眾的社教運動？這場運動的目標是甚麼？它在農村底層具體是怎樣展開的？結果又如何？當時政策規定「在工人、農民中不劃右派」，實際情形如何？這些都是值得討論的問題，也有廣泛、深入探討的空間。本文以河北省Y縣為例^⑥，依託縣、村兩級地方和基層檔案資料，嘗試為整個農村社教運動歷史研究提供一個個案文本，呈現這場底層政治運動的情形，揭示運動的複雜面相和內在邏輯。

一 社教運動的由來和部署

資料顯示，對農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最初是地方行為。1956年冬至1957年春夏，河南臨汝縣、浙江仙居縣等地方當局要求下級地方和基層「從正

面積極對農民進行社會主義的教育」，或者是「在廣大群眾中進行兩條道路的教育、階級立場的教育和法制教育」^⑦。黑龍江、陝西、山西等省區甚至將「社會主義教育」部署成一場運動^⑧。這個地方經驗不久就得到中共高層肯定。1957年7月，中共中央在青島召開省市書記會議。這個進一步部署以城市為中心的反右運動的會議，還專門討論了農村問題。毛澤東在會上講話中特別指出：農村也有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這樣的兩條道路的鬥爭」。地主、富農的一部分還在搗亂，少數富裕中農鬧退社，「想走資本主義道路」。他斷定「這樣的兩條道路的鬥爭」，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取得徹底勝利。他「贊成迅即由中央發一個指示，向全體農村人口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⑨。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之所以提出這樣一個舉措，在國內有一個重要背景。隨着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推進和「統購統銷」的實施^⑩，1956年春天到1957年上半年，各地農村普遍發生農民退社、鬧社、宰殺耕牛和牲畜、砍樹毀林、瞞產私分、上訪請願等事件，用當時官方的話說，叫「少數人鬧事」^⑪。

據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1956年12月對遼寧、安徽、浙江、江西、四川、陝西、河南、河北等八個省統計，1956年秋收分配前後，在一部分農業生產合作社內出現社員退社和要求退社的情況。浙江省的寧波專區，已退社的約佔社員戶數5%，想退社的佔20%左右。廣東全省已退社約七萬餘戶，佔社員戶數1%，並已有102個社垮了台^⑫。1957年春，一些春荒嚴重的地區接連出現搶糧和集體外出事件。山東利津、廣饒兩縣連續發生十三起搶糧事件，涉及三個區、八個鄉、三十四個村，參加的群眾有四千六百多人，共搶糧約9.2萬斤^⑬。安徽五河縣五百多人自浦口渡江到下關，聚集在下關車站要攔車去上海乞討。同一時期，安徽省委相關部門負責人前往南京，動員流入南京乞討的三千餘人返鄉^⑭。5月底，夏收臨近，一些地區反映，不少社員已做好了搶收、瞞產私分的準備。據河北省報告，麥熟較早的大名縣，已發生社員私割小麥（都是小片的）事件二十六起；靜海縣小南莊、清寧鋪兩個社，已按人口多少把麥田分到各戶，叫社員明搶暗收；臨漳縣香菜營聯村社和永年縣小騾馬社，麥田多的村已選好了人，準備在大社來拉麥子的時候，臥軌擋車來阻攔^⑮。Y縣同樣存在這樣的情況。

Y縣位於河北省東南部，地處華北平原，是一個傳統的農業縣。在該縣1956年就有一些農民對統購統銷不滿，流傳「統購統銷糟得很」、「統購統銷餓死人」的議論。W村中農劉某說：「國家把糧食弄走了，叫人挨餓。」S村中農黨員王某講：「糧食政策好是好，就是指標低，不夠吃。」G村中農李某直言：「我現在三掛腸子間着兩掛半。」^⑯農民對於糧食政策的不滿，主要是由於實行統購統銷後糧食不夠吃、吃不飽。就全國而言，自統購統銷政策開始實行至1956年，農業合作社社員的口糧實行定量，定量標準各地不一，許多地方定量大致是每人每年口糧360至380斤（原糧）。河北省的定量是360斤，每斤折合成品糧只有7.5兩（一斤十兩）。Y縣1956年遭遇嚴重洪災，人均糧食佔有量僅為197.6斤。但國家徵購並未減少，擠佔農民口糧，直接影響了農民的實際生活。該縣還實際發生了集體瞞產和農戶抗拒交糧的事件。據該縣檔案材料記載，1955年夏、秋兩季，有210個社「搗鬼」，隱瞞產量160萬餘斤。到

1956年秋收和1957年夏收，有七個村購產私分糧食110,347斤。有的村甚至將帶着玉米的秸稈當柴火分給社員^{①7}。

農業合作化運動是農民產生不滿情緒的另一個原因。合作社發展過快，特別是初級社尚未鞏固就轉成了高級社。Y縣有不少鄉、村在上級壓力下從互助組跨過初級社階段，直接升格為高級社；一些農民嫌「太早、步子太大了」。從初級社轉為高級社，土地、耕畜、大型農具等生產資料歸集體所有，實行按勞分配，取消了土地分紅，造成了那些靠省吃儉用躋身「中農」、「富裕中農」的農民情緒失落，難以接受。他們感覺財產一下子被「充公了」，抵觸心理尤為強烈。Y縣五十多個村在轉成高級社之前就有農民把自己的樹木刨掉賣了^{①8}；有的農民甚至提出再次單幹的要求。轉成高級社之後，「一刀切」的勞作時間、種植計劃以及內部管理賬目不清等問題，也引起農民普遍不滿。

對各地農村發生的「鬧事」風潮，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起初的看法和主張相對溫和。毛澤東承認：脫離群眾，不解決群眾的問題，「農民就要打扁擔，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學生就要鬧事」，他甚至斷言出了這類事是「好事」^{①9}。中央高層專門出台了一些文件，要求各地妥善處理和解決這一系列事件，調整農業合作社的相關政策和改進工作方式方法，比如民主辦社，縮小社隊規模，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增加自留地，鼓勵農民飼養家畜家禽、經營副業，等等^{②0}。

1957年夏季後，毛澤東和中共高層發動反右運動，對農村發生的一切也作了異常嚴峻的估計，一改溫和的基調。毛澤東認為，農村退社、「鬧社」風潮是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懷疑和動搖」，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主要是在農村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上的右傾」^{②1}。按照毛澤東的提議，8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向全體農村人口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以下簡稱〈指示〉），內容是圍繞合作社優越性、農產品統購統銷、工農關係和肅反問題展開「大辯論」。〈指示〉強調，「這是一場關係到農村兩條道路根本問題的大辯論，是農村群眾和鄉社幹部的社會主義自我教育，是農村的整風」。通過批判農村中的「資本主義道路」，以此使農民分清大是大非，認同國家各項根本政策，確立「社會主義是共同發展和共同富裕的唯一道路」的信念^{②2}。毛澤東對農村社教運動提出了要求，在運動中要進行三個「批判」和一個「打擊」：「批判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批判某些幹部的本位主義思想，批判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思想和個人主義思想，打擊地富的反革命行為」，而「主要鋒芒是向着動搖的富裕中農」，「對他們的資本主義思想進行一次說理鬥爭」，而且「以後一年一次」，「配合區鄉幹部的整風，配合第三類社整社」^{②3}。關於開展這場運動的做法，毛澤東指出，要「先讓農民『鳴放』」，然後「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批判之」^{②4}。

高層態度和政策的變化很快貫徹到了地方和基層，Y縣縣委在隨後下發的運動宣傳動員文件裏這樣估計農村形勢^{②5}：

我縣的廣大農村中，在近一個時期，特別是報紙上公布了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葛佩琦等右派份子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以來，已經引

起了一些地主、富農份子和其他反社會主義份子的共鳴。他們利用人民內部矛盾的幌子，利用某些群眾對糧食工作的不滿情緒，利用某些農民對新社會制度的不習慣，趁機大肆造謠破壞，散布反社會主義的言論，污蔑黨政領導，企圖煽動群眾，搞垮農業社，反對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向黨大舉進攻。他們活動的特點是：擴大缺點，抹殺成績，說「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糟得很」「農業合作化沒有優越性」。……富裕中農多數是擁護合作化制度的，但有一部分是動搖的，他們的資本主義思想在這一時期又開始抬頭，他們說合作化不如單幹優越，並主張在合作社內實行無領導的民主和自由，反對紀律和集中。在糧食徵購與夏收分配中，主張先私後公，不賣或少賣餘糧，擴大統銷指標，羨慕自由市場，非法倒運糧食，進行黑市投機活動，甚至個別富裕中農串聯退社。這樣就在農村中形成了一股反社會主義的逆流。

對於農民不滿言行性質的界定，縣委文件沿襲了中央文件的口徑，將其視作「資本主義思想」；在城市反右運動與農村社教運動的關係問題上則更進一步直截了當地指出，這些問題是農民與城市那些典型右派份子「共鳴」的結果。由此，在農村進行一場像城市反右運動般的政治運動已屬必然。Y縣的農村社教運動由是開始。

二 社教運動在村試點的開展

按照省委、地委指示，Y縣縣委對農村社教運動的開展作了具體部署。縣委決定先在A村進行試點。目的有三：一是積累經驗，二是運動預熱，三是打造樣板。A村位於Y縣城西北方向，相距6.5里，為鄉政府所在地。該村共有土地3,538畝，以農業為主，糧食作物主要是玉米和小麥^{②6}。全村總共242戶，約1,200人。據官方對階級成份的標準劃定：貧農130戶，中農60戶，富裕中農30戶，富農18戶，地主4戶。18戶富農中有一戶被管制生產，有二戶為候補社員。曾有被管制過的壞份子三人，這時均已取消管制。當過偽軍的七人，其中一人是連長級別的偽軍官。該村1938年即建立中共組織，這時有黨員二十八人，團員五十人，還有婦女聯合會等組織。該村自1952年就建立了農業合作社，到1955年轉成高級社，全部農戶都加入了合作社^{②7}。

1956年夏Y縣遭遇嚴重洪災，A村受災嚴重，全村土地全部被淹沒。1957年麥收較好，全村種小麥2,767畝，實收小麥158,286斤。按照地方政府的夏收分配計劃，國家徵收29,701斤，其餘部分按全村每人平均留糧100斤，再交售給國家8,450斤^{②8}。照此計算，小麥的徵購比高達24.1%。夏徵糧食指標過高，加之去年水災，農民很是不滿。一些農民直言糧食統購統銷政策不好，「把糧食都統給了國家，360斤不夠吃，農民生活苦」^{②9}。農民對合作社也有抱怨：「合作社減了產，不如單幹」，「合作化沒有優越性」。如前所述，360斤指的是年人均口糧，而且是原糧，加工成成品糧之後不到360斤，的確不夠，可

見農民反映的應該是實際情況。但在政府看來，農民對統購統銷的抵觸情緒是因為很多社員自己想「多分糧」，而「地主富農借機進行破壞」，還有受右派言論的影響^⑩。這或許正是該村被選為運動試點的一方面原因。8月8日，Y縣縣委派出的工作組進駐A村。Y縣社教運動的試點在A村拉開序幕。

工作組下村，首先要依託村幹部。A村的幹部對這場運動卻「各懷心思」，反應不一。農村社教運動的主要對象是地富和少數富裕中農。村黨支部組織委員卻說：「現在地主、富農不敢搞破壞了，鬧事的是富裕中農和少數貧農。」黨支部教育委員說：「群眾講怪話〔對統購統銷政策和合作化的牢騷與不滿〕也不單是地主、富農的破壞，三百六確實不夠吃。」大概是有以往政治運動的經驗，有的幹部把這場運動理解為鬥地主、整群眾，想乘機「教訓」不服管的農民。一名村黨支部委員、副社長就說：「過去小手小腳怕犯錯誤，這次可有人給做主了，非把調皮的人整一下不可。」有幹部則打算敷衍應付，合作社主任覺得宣傳一下就過去了，不礙事；也有幹部表現積極。面對這種局面，工作組採取「個別突破」的策略：從表現積極的黨支委那裏了解地主、富農的情況，再以揭發出來的「事例」作為地富反攻的證據，向有抵觸情緒的村社幹部施壓。據報告描述，這部分有抵觸情緒的村社幹部很快轉變了態度。組織委員檢討自己「思想不對頭」，社主任也表示，「這樣一搞咱們以後的工作可就好做啦」^⑪。當代政治運動的報告材料，通常是按照上級指示精神寫的。下級組織向上級反映情況，需要考慮的只是如何符合上級指示精神，對不合上級意圖的信息往往加以「轉義」、剪裁和遮蔽。A村的幹部是否真的口服心服、轉變了態度，僅憑當年的報告難以簡單認定。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至少原來消極的幹部的公開態度變得積極了。

工作組在村黨支部配合下，對全村黨團員的思想進行了摸底排隊，排出了三類人。根據1957年8月的報告：28名黨員中，思想進步、立場堅定、工作積極負責的10人，一般的13人，比較落後、不起作用甚至經常「講怪話」的5人；50名團員中，積極的21人，中間的20人，比較落後的9人^⑫。報告顯示的三類人，無論黨員、團員，落後者都是少數。摸底排隊既可將工作目標聚焦，又能透過分類形成政治壓力。工作組選拔出三十八名黨團員作為骨幹份子。骨幹份子或稱「積極份子」，是運動中表現積極、成份好的人，通常在政治運動中被動員起帶頭表率作用。正如Y縣縣委總結報告所說：「做好了培養選拔和訓練骨幹的工作，我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⑬無論在小組討論、大會辯論、了解情況等各個方面，都不可缺少骨幹力量的帶頭作用。選拔和培養積極份子開展政治運動的慣例，他們是在基層組織起到貫徹上級指示作用的強有力隊伍。

對於全體黨團員的動員，工作組採取依託骨幹份子召開小組討論會的方式進行「四算四比」和「四查」。「四算四比」即算統購統銷賬，比購銷數目；算新舊社會賬，比新舊社會；算生活賬，比過去的生活和現在的生活；算合作社的優越性，比合作化前和合作化後。「四查」即查思想、查立場、查有無右傾情緒、查對社會主義的貢獻。從當年的檔案材料來看，「四算四比」的方法有共同性，都是現身說法、回憶對比，但關鍵的技巧是拉長了比較の時段。

農民和村社幹部感到「生活水平下降了」、「糧食指標低」，大都是對合作化前後和統購統銷前後的比較；而當年實際操作中的「四算四比」，則大都是與1949年以前的農村、農民的生活相比。「解放前後」是一個重要的參照標準，意味着政治正確與否；即便是農民也明白其中的政治意涵。「四查」則以兩分法的邏輯，劃定了是非判斷的政治標準。工作組透過「四算四比」和「四查」，完成了A村試點的第一輪思想發動。村社幹部和黨團員終於明白這次運動的目標是批判社員對糧食政策和農業合作化的各種錯誤認識及右派言論，他們不僅向上級表明了積極支持的態度，而且將在下一步的運動中充當骨幹。

在全村群眾動員大會上，運動的主持者宣示了「大辯論」的緣由和目的：「地主、富農和壞份子向我們進行破壞的陰謀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讓我們重新過被壓迫剝削的生活，如果我們不把他們打倒，土地平分的勝利果實還會被他們奪去，會有人頭落地的危險。」把農村發生的問題與地富和壞份子的「破壞陰謀」聯繫起來，既是明確靶子，又告知群眾這是一場對原剝削階級的鬥爭，讓農民明白「原來地主想反攻」。A村組織了一支七十人的宣傳隊伍，以黑板報、廣播台、寫街頭詩和大字標語等形式開始宣傳，推動運動的開展^{⑤4}。

中央政策規定農村大辯論的步驟是「先鳴放，後辯論」。辯論的前提是找到對象，鳴放就是「發現」辯論對象。但駐A村工作組和村黨支部安排的大辯論，卻事先根據黨團員「揭發」的材料，先確定了大辯論的對象。也就是說，A村的大辯論在鳴放前已經預設了鬥爭對象。工作組和村黨支部確定了幾個「鬥爭典型」，在全村展開大辯論：

第一個典型是「頑偽壞份子」范某。村民范某解放前當過偽軍，是內定的辯論對象。如前所述，該村有七人當過偽軍，據材料顯示，范的「反動言論較多、態度惡」，其他人「一般的表現還都不壞」。范的「反動表現」有：公開謾罵共產黨，打擊報復黨團員；進行反動宣傳——「美國的原子彈厲害，蘇聯沒有」；煽動社員怠工生產等^{⑤5}。這在當年足以定性為「反動」。范本人是否說過這些話或怎樣說，由於檔案材料的缺失，姑且存疑。他被作為鬥爭對象，恐怕同他的偽軍經歷有關。當代政治生活中，出身「剝削階級」或有「歷史污點」的人帶有「身份陰影」，儘管失去財產或摘掉帽子，但原來的階級身份或個人經歷仍如影隨形，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往往被當作鬥爭對象。

范被作為鬥爭對象，也許還有一個原因。據當年的材料，在發動村民揭發「反動言行」時，工作組和村黨支部發現，有的人有顧慮怕被報復，不敢大膽揭發，「尤其是對壞份子范某的顧慮較多，不敢說」^{⑤6}。范有「歷史污點」，按道理村民「揭發」應該顧慮最少。村民為何顧慮最多，大概是范的性格比較「強勢」，村民才不敢揭發。一般而言，性格強勢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同村民或村社幹部失和，往往會成為村社幹部眼中不服管的「刺頭兒」，范被當作辯論對象也就不奇怪了。在運動骨幹組織的全體村民鬥爭大會上，范面對「群眾性的無情揭露和質問」，「反動氣餒」被徹底打垮，「向人民低頭認了罪」。大會宣布取消范的社員資格，實行生產管制^{⑤7}。

第二個典型是「反動富農」牛某、趙某。運動前A村唯一一戶被管制生產的就是富農牛某家。牛被揭出的「反動言論」有：「實行統購統銷國家把糧食弄

走了」，「三百六不夠吃」^③。牛家出於何種原因被管制生產，因缺少史料，無法知曉，但這足以令該戶在村中成為「異類」，被格外「關注」。與牛某不同，趙某在運動前已轉化了成份，更沒有受到管制。據檔案材料，趙的「反動表現」是到處說「合作社減了產不如單幹」，「農民的生活不如過去了」^④。從揭發材料來看，很有可能趙是一個平日愛發點牢騷、講風涼話、常抱怨的人，根本不可能有甚麼「反動企圖」，況且運動前他已經不是富農成份。但這樣性格的人被重複揭發的概率會比較高，加之曾經的富農成份成了歷史印記。在鬥爭大會後，兩人也都「低頭認罪」。趙被重新戴上富農的帽子，並與牛一樣被實行生產管制。

第三個典型是「生產不積極的地主」牛某。A村有四戶地主，運動前已全部轉化了成份。但為了證明「地主反攻」，就需要從中抓出一個來作為鬥爭典型。工作組通過摸底了解到：在已轉化成份的這些人中，「牛某生產不積極，其餘的幾人有些思想落後，但沒有甚麼反動表現」^⑤。這樣一來只能抓出相對表現不好的牛某。比起前面的范、趙等人，牛某的「問題」顯得更牽強。估計正是沒能蒐集到確切的證據，最後只好決定對其進行「個別教育」。這也反過來證明了A村中確實沒有「地主反攻」的情況。

第四個典型是「資本主義思想抬頭的富裕中農」王某。實際上，相較「地富反攻」，「富裕中農資本主義思想抬頭」更為真實、普遍：A村三十戶富裕中農問題較多的有十六戶^⑥。按照中共的階級劃分，富裕中農並不屬於階級敵人。運動的領導者針對富裕中農的問題，一般採取以小組、生產隊為單位的小型辯論會的辦法。

王某被人揭發：「喊『吃不飽幹不了』，社裏派活他也不幹了。」其所在的生產隊在掌握上述信息後有針對性地召開了辯論會。對此並不知情的他在會上繼續說：「實行糧食統購統銷富了國家，虧了農民」，「合作社減了產」。有備而來的一名社員積極份子立即發言：「國家去年供應二十二多萬斤糧食，今年麥收僅統購八千四百多斤小麥，統銷比統購多二十一萬多斤糧食。」接着另一名社員指出王「人入社，思想沒入社」的舉動：「你在耕地的時候，耕出了個大地楔子也不說給耕地的人，結果把鏟弄折了。如果你在單幹時一定會把地楔子刨出來，你這不是思想不好嗎？」當然也有個別社員表達了對王的支持。社員李某說：「糧食統購統銷好是好，就是不夠吃，國家還讓節約，連三百六都吃不上，我買了好幾斗私糧才過來了。」李剛一說完，馬上遭到一名積極份子駁斥：「我夠吃，夠吃不夠吃得看怎樣說，要吃得細、不節約就不夠吃，咱們吃飯穿衣就得論家當，現在生產的糧食還少，就得少吃點。再說去年受了災，節約點也是應當的，區裏、縣裏的幹部還吃代食品，咱們就不應該節約嗎？我認為不夠吃主要是不節約。」王最終不得不「向社員們做了檢討」，有幫腔之嫌的李也「承認了自己的錯誤」^⑦。

比起被剝奪話語權的地富，富裕中農還能說上幾句——或許是憑恃政治身份的相對優勢，抑或原本就是對糧食政策不滿的主要群體。如前所述，支部組織委員說得明白：「現在地主、富農不敢搞破壞了，鬧事的是富裕中農和少數貧農。」上述A村的幾個案例的「案主」，無一例外是被揭發出來的。除去

起決定作用的政治出身，他們平素的言行、人際關係以及過往表現都成為重要因素。

雖然A村還沒有出現運動「過火」現象，但隨後開展運動的其他村莊很快就發生了一些問題。有的村硬湊鬥爭對象：「H村一戶地主，一戶富農，卻找不到問題，覺着不解氣，就找出了思想比較落後的四戶貧農，二戶中農，確定為鬥爭對象。有的村在鬥爭地主以後又計劃鬥爭轉業軍人、偷過麪的人、貪污過草料的飼養員三種人。」也有的村在鬥爭地富時「威脅嚇唬」鬥爭對象，甚至「打人、捆人、拉人」^{④③}。

概括而言：排隊摸底，圈定目標對象，進而分類處理——對農民耐心地進行思想教育，使之認識到統購統銷政策的優越性，以此自覺檢查與批判其在糧食問題上的「資本主義思想」，對個別帶有嚴重「資本主義思想」的富裕中農着重說理批判，批駁其「資本主義思想」；反擊少數地富、反革命份子的「破壞活動」以及反攻倒算行為，依法處理個別嚴重份子——這就是當年A村進行社教運動的流程。

A村的試點是在8月22日左右結束的。25日，縣委〈在A村開展社會主義大辯論的經驗〉文件下發到了各區、鄉黨委和工作組。按照縣委的初始規劃，全縣農村共分三批進行，在試點之後緊接着開始的是規劃選出的第一批進行的六十七個村莊。這部分村莊開始了對A村社教運動模式的複製^{④④}。

三 農民的鳴放

1957年9月22日，Y縣縣委下發〈關於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再次指示〉（以下簡稱〈再次指示〉），部署社教運動，即全民性的整風運動，改為四步進行。同A村的試點過程相比，在排隊摸底前增設「鳴放」為第一步，倡導大鳴大放。關於鳴放，文件指出：「鳴放的方法是提意見、發議論，農村一律不搞大字報；依法管制的壞份子不得參加鳴放；鳴放的重點應引導群眾，放到糧食、合作化等根本問題上、大是大非上去。」^{④⑤}這表明鳴放前運動的領導者已有明確的目標預設。

比起運動一開始的摸底排隊，底層幹部對鳴放的抵觸情緒更大也更普遍。多數幹部認為鳴放就是讓群眾挑幹部的毛病，以幹部為靶子。X村公安員說：「放是該放，就怕都朝幹部進攻，把幹部放倒了，還不如不放。」^{④⑥}T村社主任說：「咱老粗幹部缺點多，趁早歇了吧。」^{④⑦}L村二十三個生產隊長，有十二個人認為鳴放就是整幹部，情緒不穩定，打算不幹^{④⑧}。平時工作作風粗暴、愛佔點社隊小便宜、有貪污問題的幹部在討論會上則一言不發^{④⑨}。也有一些幹部怕鳴放開了，掌控不了。D村婦聯主任說：「過去批評還有些人硬說糧食不夠吃哩。要放更亂說不夠吃了。」G村公安員說：「在群眾、地主、富農中調皮搗蛋的甚麼人都有，可怕放亂了。」一名常姓黨員也說：「亂放起來可怕出問題。」^{⑤①}還有幹部擔心搞運動耽誤生產。Q村公安員說：「現在正在秋收種麥忙的很，過秋後有甚麼工作再搞不行嗎？」^{⑤②}X社主任說：「上級說運動

宣傳是生產的動力，我看這恰恰成了阻力。」^{⑤2}L村一名支部委員說：「白天幹活晚上開會，時間長了可受不了。」^{⑤3}對地富的辯論鬥爭所產生的威懾作用，幹部也都心知肚明。Q村在支委擴大會議上，七個人中有五個人認為鳴放不起來。支部宣傳委員說：「鬥爭了地主富農誰還敢鳴放呢？」^{⑤4}有些運動還沒開始的村有幹部說：「別的村又辯論又鬥爭，誰還敢放。」^{⑤5}這是實情，更是常識。Y莊富農宋某在鳴放中一言不發，私下裏說：「誰還敢說心裏話，說出來不鬥爭就得辯論。」C莊曾被鬥爭過的四戶地富，有三戶在後來的運動中一句話也沒說過^{⑤6}。

普通農民也都有自己的想法和顧慮。怕提了意見事後遭報復，這是民眾最普遍、最大的顧慮。J社一位社員說：「鳴放是一時的事，過了還是人家當幹部，得罪了幹部可過不了。」另一名社員也說：「現在不報復將來也不保險，抓不住蝨子燒個襖。」^{⑤7}除了事後的顧慮，有一部分農民更是有着眼下的擔心：「說對了沒事，說錯了扣上個反動帽子辯論一下可受不了」^{⑤8}；「咱不會說話，說錯了成了鬥爭對象受不了」^{⑤9}。對提出的意見能否落實，農民也不抱太大期望。他們大都認為「提了也不准頂事，白落個得罪人。」^{⑥0}過往的經歷使農民具備一定的防範心理。

鳴放受阻，僵局一時打不開，工作組開始「對症下藥」。他們向幹部灌輸對黨員幹部採取保護的政策，以打消他們普遍存在的「怕引火燒身」的顧慮。對於自身有些小問題的幹部，工作組也向他們表明這次運動不是整幹部、整黨員，並指出幹部的問題先在黨內鳴放，把問題鳴放出來是為了幫助他們解決自身思想認識問題，而非作為鬥爭對象^{⑥1}。這些都是向幹部交底，算是給幹部派了顆定心丸。對於那些對運動有厭倦情緒和敷衍心理的幹部，工作組就採用找問題倒逼他們服從的辦法。糧食不夠吃是實情，農民的不滿也是普遍的，在這種情況下找出點問題不是甚麼難事。在政治施壓下，絕大部分幹部轉變了態度，個別依舊「未覺悟」的村社幹部也被及時撤職。

X村支書許某就是個典型。10月7日，縣委召開糧食會議，根據社隊幹部對糧食工作的態度，給他們進行了政治排隊。許被劃為「抗拒糧食政策」和「不要黨的領導」的落後份子。會議文件顯示，許在會上說：「瞞產私分是因為糧食指標低擠的」，「上級不信任下級，上級放手，別管甚麼工作也能做好」。許在上級領導面前之所以有這般言論，既是對糧食政策不滿，也是為自己的辯護，因為一名貧農社員向上級舉報他「在今年麥季主謀瞞產三萬多斤」^{⑥2}。對於糧食會議的具體排隊結論，許本人自然是不知曉的，但心裏也有數。事後許曾說：「在縣裏開糧食會議時，就安排了我一下子，還不知道落甚麼結果呢。」^{⑥3}大概上級是出於以觀後效的打算，許只是被警告了一下。但運動開始後，許並沒有做出上級期望的將功補過之舉，X村運動在許的主持下進展緩慢。據統計，截至10月23日，第一批開展運動的六十七個村，只有X村、G村兩個村尚未推向群眾。很快，許就因「自身問題嚴重且不積極領導運動」被撤職，先前在糧食會議上的言論也變為「反黨反社會主義」性質^{⑥4}。顯然，相較「主謀瞞產三萬多斤」，許在運動中對上級政策和意圖的違背，才是造成其最終結局的主要原因。

按工作組的授意，各村支部將村民已經放出的言論進行分類排隊，找出問題，馬上進行解決，樹立威信，以此提高他們鳴放的積極性。就材料來看，解決的都是諸如社隊幹部作風粗暴、合作社賬目不清、公共財物保管不善等一些無關「大是大非」的問題。

骨幹份子更是以各種方式推動鳴放。工作組選擇骨幹的條件是：說話負責，能夠大膽發言和了解情況較多的表現積極的黨團員和貧農、下中農。根據二十二個村的統計，共訓練運動骨幹814名，其中群眾積極份子250名^⑥。運動的主持者考慮到「反動言論在一定溫度下才能出現」，就安排骨幹在鳴放會上帶頭鳴放，而且還「有意識地引導群眾朝大是大非問題上鳴放」，把鳴放的方向控制在可掌控的範圍內^⑥。

為了更順利地收集「反動言論」，各村將鳴放過程融入了生產場合和其他場合。即根據骨幹力量多少，有計劃地把骨幹配備到生產場合或閒暇場合，利用勞作休息間隙與群眾進行漫談，定期召集骨幹匯報鳴放情況，收集匯總各種言論；骨幹的作用也就由會場內延伸到會場外。M村骨幹劉某利用隊裏集體收玉米秸稈休息時，有意跟富裕中農王某攀談：「這樣小的棒子秸稈還能打多少糧食。」王緊接着說：「要不俺說不夠吃，這個樣的棒子稈怎麼能打了糧食，這就更不夠吃了。」B村骨幹何某借推碾子的機會到社員閻某家，扯起了糧食夠吃不夠吃的話頭，閻不滿地說：「肯定不夠吃啊。」^⑦

在發動鳴放初期，〈再次指示〉明確規定農村的鳴放一律不搞大字報，但一些鄉村還是張貼了大字報。Y縣當局不僅沒有阻止，反而肯定「推開大字報的方法靈活切實可行。望各工作組及支部根據本村情況研究採用。普遍推開大字報進行鳴放，把鳴放迅速推向高潮」^⑧。當局既然肯定，大字報的辦法很快為各鄉村效仿，為運動主持者開闢出更多收集言論的渠道。有些鄉村還增設意見箱，動員農民寫意見信，實際上是大字報形式的翻版。

截至10月23日，根據對已開展運動的五十個村的分類統計，共鳴放出問題9,090條。其中關於合作社方面的4,115條，集中反映入社不如單幹強，高級社不如初級社；關於糧食、棉油供應方面的809條，主要是說口糧指標低，不夠吃；關於幹部作風方面的2,393條，大多不滿幹部作風粗暴簡單；關於工農關係方面的91條，主要反映農民吃糧少、生活苦，工人和機關幹部吃糧多、生活好；其他方面1,682條^⑨。依史料看，匯總的意見，地富並沒多少言論，言論較多的是富裕中農。至於被管制的壞份子，他們一開始就不在鳴放範圍之內，被剝奪了話語權。Y縣社教運動的整個鳴放過程，在農村社教運動一開始就有其明確的目標預設，並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發表意見的環節。事實上，鳴放成為了印證預設的環節。

四 辯論和結局

1957年10月底，在經過鳴放「進行政治鬥爭和說理批判的對象已經明顯」後^⑩，Y縣的社教運動轉入辯論階段。絕大多數辯論的方式、方法都套用了

A村的現成經驗。固然A村屬問題多、情況複雜的典型代表，但也不可能覆蓋所有的問題。因此，運動鋪開後的辯論環節也出現了一些新情況。

L村對富農何某進行了兩次辯論鬥爭。何因被揭發曾抱怨「糧食指標低，不夠吃」，被確定為鬥爭對象。在第一次辯論中，何本人對此「拒不承認」，辯論骨幹一時也找不出充實的證據，以致「會場靜寂，群眾情緒低落，結果辯論失敗」。據稱何事後還直言「他們叫我開會而搞半天是辯論我，我看他們能把我怎麼樣」，這樣的辯論效果是運動主持者不能接受的。他們準備組織對何的第二次辯論。在工作組看來，上一次辯論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對鬥爭對象「反動言行了解掌握不透」和辯論骨幹「聯繫是非問題鬥爭說理訓練不足」^①。換言之，要蒐集何更多的日常言行材料和教會辯論骨幹如何小題大做。第二次辯論會上，一名骨幹率先發言，「你說過看不慣隊裏男女一塊幹活，這是封建思想所支配，是看不慣新社會的事物，就是想走回頭路，你這是反動」。緊接着另一名骨幹斥責道：「你上次被辯論後，不服氣，吹大話，罵幹部，這是拒絕改造，仇視幹部和廣大人民，反黨反社會主義。」一名貧農則翻出了陳年舊賬：「舊社會你掌斗子〔負責稱重〕的時候，有人說你量黑豆時明明量了10石，給人家說11石。人家看着少，你說過過吧，你把一塊切糕抹在斗子裏，一過就成11石還多哩，你說你這不淨剝削人嘛。」何最後「低頭認罪」，工作組宣布由群眾對其進行監督，並號召群眾進一步孤立他^②。

第二次辯論中也沒有找出何對糧食政策、農業合作化的不滿言論。只是將何以往日常生活中為人處世方面的個別瑣事生硬附會到思想認識和政治立場上。這也再次印證富農的確大多都沒甚麼出格言行，只是富農的身份使他們在運動中首當其衝。大概也正是因為沒有確切的證據，何沒有受到諸如重新戴帽、管制生產等具體的處罰。實際上，被孤立就等同於被宣布為階級鬥爭的對象。一個人一旦被劃為階級鬥爭的對象，政治上就失去了安全，淪為被排斥的「異類」。通過聯繫階級鬥爭，產生一種效應，製造一種恐懼，這正是運動的邏輯所在，也是運動要達到的目的之一。

T村出現了鬥爭大會（又稱「辯論大會」、「說理大會」）的形式。它是指由全體社員或全村農民參加的辯論會。中共中央一開始部署農村社教運動的〈指示〉就對大規模的辯論持謹慎態度，主張除非必要情況，辯論「一般地在小組或小隊的範圍內」進行^③，主要擔心大規模的辯論會不容易掌握，一旦失控，會產生負面效果。而實際中，辯論大會大都成了簡單粗暴的鬥爭會。運動初期，河北省徐水、清苑兩縣在鬥爭大會上甚至遊街中發生打人、拉人、「右派帽子滿天飛」等現象。對此，省委專門下發文件進行糾偏，強調以理服人，名之說理大會^④。

T村鬥爭大會的對象是該村的一戶富裕中農王某。在這之前，王已經在生產隊範圍內的辯論會上被批判過了。鬥爭大會上，主持人先介紹了所掌握的王的「反動言行」：不缺糧喊缺糧、說合作社不如單幹、自己搞副業不參加社內生產；隨後由安排好的辯論骨幹發言。一名貧農骨幹說：「你說合作社不如單幹好，有糧食喊不夠吃，這是反社會主義，想走回頭路。」一名黨員說：「你資本主義思想太嚴重，入了社不幹活，光自己搞副業，你說你是不是想走資

本主義道路。」另一名骨幹說：「你一心想做小買賣，搞投機，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⑦

根據縣委文件，鬥爭大會有限定的適用對象，即「有反動言論的地富、反、壞份子和富裕中農中極右份子（也稱富裕中農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骨幹份子）」^⑧。至於何為「富裕中農中極右份子」，縣委文件沒有給出解釋。而此前河北省委針對徐水、清苑兩縣運動中出現過火問題的糾偏文件指出：「不只有資本主義思想，還有反社會主義的破壞活動（如不只本人要求退社，還積極策動搞垮合作社，不只偶而違犯統購統銷與市場管理政策，還一貫進行投機活動、擾亂市場等），不只是一般的反社會主義的份子，而且是其中最突出、最惡劣、最不得人心的骨幹份子。」^⑨目的是想把打擊面縮到最小限度。這一標準看似嚴苛，但總體比較抽象，彈性很大，難以把握。所以，儘管中共中央和河北省委在農村社教運動初期都意圖進行限制，但運動開展中並沒有起到真正作用。

僅就上述材料中所列舉的王的「反動言行」來看，顯然是夠不上「極右份子」的；其最大的問題是「搞副業」。王在村裏做點小買賣，集體經濟下，這通常被視作「走資本主義道路」、「農村資本主義尾巴」。合作社對從事副業的社員通常有着嚴格限制。有的社實行交款記工，1元一工分（一工分折合0.5元），有的甚至剋扣農產品的分配。1957年麥收分配中，Y縣有些受災村對「推小車搞副業」的社員就不分小麥。其他社員對經營副業的社員也心有不滿，他們譏諷災後沒分配到小麥的社員：「你這怎麼又找社幹部、隊長啦，叫你幹活的時候，打着燈籠也找不到你」；「你們小車一轉，又是錢又是白麪，還缺甚麼糧啊」^⑩。一般來說，從事副業的社員收入相對高些，其他社員難免嫉妒。這使經營副業的社員在運動中也就更容易成為眾矢之的。

文中所摘引的幾個辯論例子，均來自於縣委編印的整風材料。辯論所涉及的對象的「反動言行」，很難考證其真偽。至於經過辯論，被辯論的對象是否真的口服心服或口服而心不服，更是不易判斷。呈現當年辯論場景的意義，在於透過它可以了解農村社教運動是如何以各種方式，或引導或高壓，促使被辯論對象就範，達到「教育」更多農民的目的。爬梳瑣碎、具象的辯論細節會發現，在事實層面，辯論一方的理由很難說充足，遑論可靠，但卻有強勢的政治話語，在這種語境下，鄉村日常生產、生活的細枝末節，都被貼上「舊社會—新社會」、「剝削—走回頭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國家—集體」等標籤，而具有了超出日常生活的政治意涵。1949年以降，新政權對社會進行全方位改造，一整套新的話語體系取代了舊時代的話語體系，不僅在政治生活層面成為主流話語，而且滲入社會生活層面，鄉村生活亦是如此。農村社教運動中，被辯論一方在這套話語面前，除了服從或者「退守」，幾無招架之力。

1958年4月，Y縣社教運動接近尾聲。據六十二個社的統計，運動中鬥爭地富份子385人，其中325人重新戴上地富的帽子，25人被管制生產，7人被行政管制，8人被逮捕法辦^⑪。按照處理規定，「社隊瞞產私分的糧食尚存有實物的應退回原物或按政策增購抵消；屬於現款部分，應計入該年農業總收

入內，統一計算分配，抵頂該隊的分紅數；用購產的糧食所置買的物品，其糧食不再增購抵消和抵頂分配，可將所購買的物品作為社內的公共財產。對於幹部貪污、借款和佔便宜的問題，屬於糧食的，應參照社隊購產私分的辦法解決；屬於現款的，應一律退回，有能力者應立即退清，無能力者可分期退還；數目不大的，除退還外，只給以嚴厲批評，不戴貪污帽子，不作其他處理」^⑥。可見，在集體購產私分和社隊幹部多得多佔問題上，總體原則是退還原物或作相應賠償，而未在政治方面作深究。

在運動收尾整改階段，各農業合作社都重新調整了幹部隊伍。據三十二個農業合作社的統計，新選出幹部507名，其中貧農253名，下中農29名，中農134名，上中農22名^⑦。幹部隊伍調整的一個明顯變化，就是運動中那些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好的積極份子脫穎而出，被選進了幹部隊伍；相反，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不好、表現又不夠積極的幹部，則被剔除出幹部隊伍。不久之後，在這樣一支底層幹部隊伍的帶領下，大躍進運動在Y縣轟轟烈烈地上演。如果說幹部隊伍的變化是農村社教運動一個方面的結果，那麼另一個方面的結果，則是「廣大農民社會主義覺悟大大提高，積極踴躍交糧」^⑧，Y縣各鄉村都足額甚至超額完成了糧食徵購任務。

五 結語

Y縣的社教運動，是全國範圍農村社教運動的一個個案。這一個案是否具有普遍意義，或者說是否具有代表性或典型性，需要對若干個案或群案進行梳理和比較才能判斷。儘管如此，一場由高層部署的全國範圍的運動在各地推進，在指導方針、基本原則、總體安排方面還是有其共性的。透過本文的梳理和分析，Y縣的農村社教運動，或者放大些說，整個農村社教運動，呈現出當代政治運動的諸多貫通的政治邏輯。

中共高層最初部署農村社教運動時，規定了這場運動與同期進行的城市反右運動的區分。如前所述，毛澤東定下了「說理鬥爭」的基調，中央也專門發出通知，要求在工人、農民中不劃右派，已經劃了右派份子的應當改正^⑨。無論名稱還是政策，農村社教運動與城市反右運動看上去都有差異。

然而，筆者經過細緻研究發現，兩者之間實際上有很多相似性。如前所述，農村社教運動的重要背景是當時各地農村普遍發生退社、「鬧社」、「鬧糧」等事件。農村底層的社會異動，緣於統購統銷實施以後的過高徵購和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急速推進。對農村發生的問題，高層最初估計相對平和，也考慮透過政策的調整和工作的改進等相對溫和的策略來解決。但是城市反右運動開始後，高層對農村發生問題的觀察發生倒置性變化，將農村社會異動同階級鬥爭相聯繫，認定是一部分地富的「搗亂」和富裕中農「想走資本主義道路」，定性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兩條道路的鬥爭」。這種觀察和估計的變化，同高層認定黨外人士的鳴放是「反共反人民」的「右派猖狂進攻」^⑩，在邏輯上是一脈相通的。

農村社教運動的實施方法、實際步驟和處理結果，也與城市整風、反右運動異曲同工。如前所述，農村社教運動是「先讓農民『鳴放』」，然後再「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批判之」。這裏所說的「不善者」，即「資本主義思想」。先鳴放、後批判，也正是整風運動轉向反右運動時高層「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策略^⑤。雖然按照高層的要求，農村社教運動不在農民中劃右派份子，但在處理上，還是要求給一部分人重新戴上地主、富農的帽子，或者戴上「壞份子」、「反社會主義份子」的帽子。這類帽子同「右派」帽子，名稱雖然不同，但在政治身份上同屬一個類別，此後即有「地富反壞右」的聯稱。戴上這類帽子的農民，大多在鄉村被監督勞動，處以生產管制、行政管制，也有少數人被逮捕法辦，與「右派」被監督勞動、勞教，列入社會階層的另類沒有實質差別。

正如前述有的學者所指出的那樣，這場農村社教運動實際上是城市反右運動在農村的延伸和鋪展，可以說是一場鄉村底層反右運動。其規模、範圍由於農業人口的絕對數量和在總人口中所佔比重，實際上超過了城市精英階層的反右運動。囿於條件，筆者無力統計在農村社教運動中全國到底有多少農民被重新戴上地富帽子，「壞份子」、「反社會主義份子」等帽子，只是確知Y縣社教運動中有325人被重新戴上地富帽子。可以肯定的是，戴上這些帽子的人不會計算在五十五萬餘「右派份子」之內^⑥。學界以往對反右運動歷史的研究，忽略甚至遮蔽了涉及更大範圍的這場鄉村底層反右運動，或者只是將其視為一場「思想教育運動」，不能不說是一種缺失或誤讀。

承前所論，農村社教運動有兩個基本動因。一個動因是農業合作化問題。1949年以降，新政權對社會實施全方位改造，「社會主義國家」的觀念成為主流話語，日益滲入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剛剛基本完成，農村底層就發生退社、「鬧社」風潮，令高層敏感和擔憂：社會改造在農村中特別是在農民觀念上收效不著，農民對社會主義的信心還不強，覺悟還不高，甚至對社會主義動搖和背離，這些勢必給新生的農村合作組織的鞏固帶來危險。農村社教運動就是要在農村底層強化「社會主義國家」觀念，形塑「社會主義新農民」，以鞏固農業合作社。

另一個動因是糧食問題。中國的工業化建設，對糧食需求量大。但是，毛澤東指出：「我國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的生產水平，現在是很低的，而國家對於這些物資的需要卻是一年一年地增大，這是一個尖銳的矛盾。」^⑦為了解決這個矛盾，中央設計了統購統銷的政策。統購統銷是運用行政手段，將糧食的收購和銷售納入計劃軌道，保證政府絕對掌控糧食資源，以支撐工業化建設。在高層看來，農村的瞞糧、「鬧糧」問題，會加重國家需求與糧食資源不足這個「尖銳的矛盾」。醞釀農村社教運動時，毛就表示過這種擔心：「如果八百五十億斤左右的糧食收不到手，則牽動市場物價，牽動整個國民經濟計劃的順利進行，並且無法應付緊急情況，這是很危險的。」他在提出開展農村社教運動時，說得斬釘截鐵：「三百五十億斤徵糧和五百億斤購糧，必須堅決收到，不能短少。」^⑧850億斤是當年全國糧食徵購計劃，毛如此強調完成這一計劃的必要性，再也明白不過地表明農村社教運動並非單一的意識形態

目標，還有政策功利的目的。《人民日報》、《河北日報》當年用大量篇幅來報導農民「踴躍」向國家交售糧食的事例。1957年全國糧食徵購最終完成960億斤^⑨，竟超過原定徵購計劃110億斤，佔原計劃的12.9%。這個結果無疑同農村社教運動有極大關聯。

Y縣農村社教運動的辯論話題涉及廣泛，但核心的話題就是合作社和統購統銷。無論是縣委的部署還是基層幹部和骨幹的動員，大辯論始終圍繞這兩個核心話題展開。合作社和統購統銷也被當作農村社教運動成功與否的考量標準。運動的意識形態和政策功利的雙重取向，既是要重塑「社會主義國家」觀念，又是要保障國家對糧食資源的汲取。

概而言之，1950年代的農村社教運動，其實是將「思想問題」升格為「階級鬥爭」。農民在日常生產和生活中的「負面」言行，被貼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標籤後，「認識問題」便成了立場問題。這是當代政治生活和政治運動的基本邏輯之一，這一邏輯在實踐層面極具「有效性」。Y縣的社教運動就呈現出這種特徵，一方面在農村中形成了政治高壓的氛圍，另一方面在農村底層社會進一步造成了人群社會身份的區隔。這是階級鬥爭貫穿於政治運動、政治生活乃至日常生活的結果，也為此後的政治運動提供了經驗。這一經驗的「有效性」，也在後來的歷次政治運動中被屢次驗證。

1950年代中期發生的農村社會異動，本來為進一步解決農業合作化運動過急、過粗、過於簡單化等遺留問題提供了契機，而高層和地方也開始着手解決。然而，這一契機由於階級鬥爭的泛化和虛化而喪失，已經起步的正面努力也為之中斷，事情向相反的方向變化。正如〈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的：「由於我們黨的歷史特點，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在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進程中出現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問題時，容易把已經不屬於階級鬥爭的問題仍然看做是階級鬥爭，並且面對新條件下的階級鬥爭，又習慣於沿用過去熟習而這時已不能照搬的進行大規模急風暴雨式群眾性鬥爭的舊方法和舊經驗，從而導致階級鬥爭的嚴重擴大化。」^⑩這或許是研究這一段歷史最應該思考的問題。

註釋

① 孫東方：〈「大躍進」前夕的一場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山東昌濰為個案〉，《當代中國史研究》，2006年第4期，頁30-38。

② 李若建：〈庶民右派：基層反右運動的社會學解讀〉，《開放時代》，2008年第4期，頁48-70；〈中共中央關於在工人、農民中不劃右派份子的通知〉（1957年9月4日），載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二十六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頁146。

③ 韓鋼：〈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載郭德宏、王海光、韓鋼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第二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頁181。

④ 王海光：〈1957年的民眾「右派言論」〉，《炎黃春秋》，2011年第3期，頁17-23。

⑤ 程曦敏：〈四川省江津縣直屬機關反右派鬥爭的「收」「放」變遷〉，《中共黨史研究》，2015年第4期，頁89-98。

⑥ 依據相關檔案管理規定和學術規範，本文對所引用檔案中的地名、人名都進行了相應技術處理，以化名代指。

- ⑦ 〈中共河南省委關於臨汝縣「鬧社」問題給各級黨委的指示〉（1956年12月21日）、〈楊心培同志關於仙居縣群眾鬧事問題的報告〉（1957年6月），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編：《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1949-1957）》，上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頁659、698。
- ⑧ 〈黑龍江、陝西開展聲勢浩大的社會主義宣傳運動，向廣大農民宣傳合作制度的優越性〉、〈明是非，正視聽〉，《人民日報》，1957年2月10日，第3版；〈山西全面總結合作化第一年的辦社工作〉，《人民日報》，1957年2月11日，第3版；〈農業社怎樣進行政治思想工作，山東總結若干經驗〉，《人民日報》，1957年2月23日，第3版；〈黑龍江掀起春季生產高潮〉，《人民日報》，1957年4月25日，第3版。
- ⑨②⑧ 毛澤東：〈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1957年7月），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458；458；459。
- ⑩ 1953年，中國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隨着工業化建設的開展，糧食、棉花、油料等出現嚴重供需矛盾。為解決這一問題，1953年底國家開始陸續對糧食、棉花、油料等重要的農產品實行計劃收購（統購）和計劃銷售（統銷）。參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頁255-83。
- ⑪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395。
- ⑫ 〈關於退社和大社問題〉（1956年12月6日），載《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1947-1957）》，上冊，頁655。
- ⑬ 〈山東利津、廣饒兩縣群眾搶糧事件經過和處理情況〉，《內部參考》，第2222期（1957年5月31日），頁3。
- ⑭ 〈堅持說服教育的方針，三千多災民被勸說離開南京返鄉〉，《內部參考》，第2178期（1957年4月13日），頁6。
- ⑮ 〈河北省夏收分配中各種矛盾日益尖銳〉，《內部參考》，第2222期，頁13-14。
- ⑯ 中共Y縣委：〈開展社會主義大辯論的經驗〉（1957年8月25日），Y縣檔案館，1-1-51，頁2-3。
- ⑰ 中共Y縣委整風辦公室：《關於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周報》，第2期（1957年9月1日），Y縣檔案館，1-1-51，頁2。
- ⑱ 中共Y縣委：〈關於為適應社會主義群眾運動高潮切實加強黨的思想工作的初步規劃草案〉（1955年12月），Y縣檔案館，1-1-38，頁9。
- ⑲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11月15日），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324、325。
- ⑳ 參見〈國務院關於農業生產合作社糧食統購統銷的規定〉（195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農業生產合作社秋收分配中若干具體問題的指示〉（1956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關於民主辦社幾個事項的通知〉（1957年3月15日），載《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1949-1957）》，上冊，頁628-29、634-39、674-75。
- ㉑ 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月），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331。
- ㉒⑳ 〈中共中央關於向全體農村人口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1957年8月8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頁528-30；530。
- ㉓ 當時一般都把辦得比較好的、中等的和不好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分別稱作「一類社」、「二類社」和「三類社」。參見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1955年7月31日），載《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1949-1957）》，上冊，頁364，註釋1。
- ㉔ 中共Y縣委：〈關於在農村中開展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宣傳教育運動的指示〉（1957年8月18日），Y縣檔案館，1-1-51，頁1。
- ㉕ Y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Y縣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頁73。
- ㉖⑳⑳⑳⑳⑳⑳ 中共Y縣委：〈關於在A村開展社會主義大辯論試點的報告〉（1957年8月13日），Y縣檔案館，1-1-63，頁1；3；3；4；3-4；4。
- ㉗⑳⑳⑳⑳⑳⑳⑳⑳⑳⑳ 中共Y縣委：〈在A村開展社會主義大辯論的經驗〉（1957年8月25日），Y縣檔案館，1-1-51，頁1-2；3；3；3-4；4；4；4；5；5；7。

- ④③ 中共Y縣委整風辦公室：《關於農村整風情況的周報》，第3期（1957年9月27日），Y縣檔案館，1-1-51，頁1。
- ④④ 但在運動實際開展中，批次和數量也都發生了變化。
- ④⑤ 中共Y縣委：〈關於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再次指示〉（1957年9月22日），Y縣檔案館，1-1-51，頁3。
- ④⑥④⑦④⑧ 中共Y縣委：〈關於X村等村統一支部思想在黨內開展鳴放的通報〉（1957年10月3日），Y縣檔案館，1-1-51，頁2；2；2；4；4。
- ④⑦④⑧④⑨ 中共Y縣委整風辦公室：《關於農村整風情況的周報》，第6期（1957年10月23日），Y縣檔案館，1-1-55，頁4；2；3；5。
- ④⑧④⑨⑤ 中共Y縣委整風辦公室：《關於農村整風和普遍開展社會主義大辯論情況的周報》，第13期（1957年12月11日），Y縣檔案館，1-1-63，頁3；1；1-2。
- ④⑨⑤ 中共Y縣委整風辦公室：《關於農村整風和普遍開展社會主義大辯論情況的周報》，第10期（1957年11月20日），Y縣檔案館，1-1-55，頁2；1。
- ④⑩⑤ 中共Y縣委：〈對當前農村社會主義宣傳教育運動中存在的問題的解決意見〉（1957年10月21日），Y縣檔案館，1-1-51，頁1；2。
- ④⑪ 中共Y縣委整風辦公室：《關於農村整風情況的周報》，第5期（1957年10月18日），Y縣檔案館，1-1-55，頁1。
- ④⑫ 中共Y縣委整風辦公室：《關於農村整風和普遍開展社會主義大辯論情況的周報》，第11期（1957年11月26日），Y縣檔案館，1-1-55，頁1。
- ④⑬ 中共Y縣委整風辦公室：〈對農村支部和主要黨員幹部摸底情況的報告〉（1957年10月23日），Y縣檔案館，1-1-55，頁2。
- ④⑭④⑮④⑯ 中共Y縣委整風辦公室：《關於農村整風情況的周報》，第7期（1957年10月28日），Y縣檔案館，1-1-55，頁2；3；4；5。
- ④⑮④⑯ 中共Y縣委：〈關於當前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幾個問題的通知〉（1957年10月8日），Y縣檔案館，1-1-51，頁2。
- ④⑰ 中共Y縣委：〈XXX莊社推開大字報的幾點方法的通報〉（1957年11月11日），Y縣檔案館，1-1-63，頁1。
- ④⑱④⑲ 中共Y縣委整風辦公室：《關於農村整風和普遍開展社會主義大辯論情況的周報》，第14期（1957年12月17日），Y縣檔案館，1-1-55，頁2。
- ④⑳ 〈保定地委關於徐水、清苑兩縣在社會主義宣傳運動中發生的問題向省委的報告〉（1957年8月1日），載《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1947-1957）》，上冊，頁712。
- ④㉑ 中共Y縣委整風辦公室：《關於農村整風情況的周報》，第9期（1957年11月11日），Y縣檔案館，1-1-55，頁1。
- ④㉒ 中共Y縣委：〈關於農村整風社會主義教育的幾點經驗介紹〉，Y縣檔案館，1-1-51，頁1。
- ④㉓ 〈河北省委關於在農村大規模開展社會主義宣傳教育的指示〉（1957年9月1日），載《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彙編（1947-1957）》，上冊，頁708。
- ④㉔④㉕④㉖④㉗ 中共Y縣委：〈關於一九五八年第一季度的工作總結〉（1958年4月27日），Y縣檔案館，1-1-87，頁1；4；1-2；4。
- ④㉘ 〈中共中央關於在工人、農民中不劃右派份子的通知〉，頁146。
- ④㉙④㉚ 毛澤東：〈事情正在起變化〉（1957年5月15日），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422-29；425。
- ④㉛ 參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頁620。
- ④㉜ 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頁181。
- ④㉝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中國農民負擔史》編輯委員會編著：《中國農民負擔史（1949-1985）》，第四卷（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0），頁243。
- ④㉞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人民日報》，1981年7月1日，第1版。